

慈濟的跨宗教合作經驗 ——「百川歸海」的譬喻和詮釋

Experiences of Tzuchi 's Interreligious Cooperation ;
Explaining the Metaphor “All Streams Going to the Sea”

盧蕙馨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宗教交談中學者所提的「百川歸海」譬喻，以及證嚴法師所歸結的類似說法「宗教如大海」，在慈濟國際救援宗教合作經驗中展現何種涵義，其呼應當今宗教共同促進人類福祉的倫理需求上有何特色。研究資料為證嚴法師的言論，慈濟刊物的海外援助報導，以及筆者在印尼和南非的實際田野觀察訪談。研究發現，慈濟不傳教的人道救援，證嚴法師教化強調對其他宗教的包容性，落實為不為私己的「大愛」行動，志工對災民的照顧服務和長期陪伴，慈善觀宣揚人人皆可為善助人，無助人者與受助者之分，是其在許多不同宗教信仰地區被接納，甚至影響其他宗教信徒加入志工行列的原因，慈濟也提供他們信念實踐的機會。本文顯示，苦難形成宗教合作的契機，喚起各宗教崇尚的互助互愛精神，深刻的宗教交談來自面對天災人禍時的共同行動。慈濟的跨宗教合作經驗對「百川歸海」的譬喻提供三種詮釋，包括人心歸向和實踐「大愛」的潛能和作為、宗教包容他者的胸襟，以及宗教對全球苦難的首要關懷。

關鍵詞：大愛、百川歸海、全球倫理、宗教對話、苦難

前言

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交通資訊發達，人們有機會接觸多元豐富的宗教文化，宗教哲學學者何光瀟說：「不同宗教、不同價值體系、不同精神文化和不同歷史傳統之間的相互接觸日益增多，由此不能不開始彼此對話和增進理解的過程。」（2008：11）然而，他也指出，在人類物質層面的生活方式已經高度一致化的同時，精神層面的全球化仍嚴重滯后，不同群體的信仰、宗教、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等等之間存在對抗、衝突。我們也看到本世紀以來，因宗教之間的對峙和敵意發動的戰爭，已引發中東、阿富汗等地區動亂不已，摧毀無數的家園和生命。因此，宗教之間相互瞭解，乃至於如何相互合作，已成爲從上世紀以來全球性的重要議題。

在勾勒宗教和平共處的願景方面，何光瀟提出「百川歸海」的比喻。他說：「百川之相通，只在於接海——源於海，歸於海；諸教之相通，只在於信神——起於神，歸於神。」又解釋「百川」乃喻各實存宗教，「歸海」乃喻其宗旨歸一，當然各河川不相通，有相異性，「歸一」是所有河川終極的源泉和歸宿，「歸海」是「指其趨向而言，非指其現實狀況」，因爲我們未到達大海之時，只看見百川爭流（2008：2-3）。宗教比較研究學者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也提出類似的觀點說：「幾個世紀以來，各種宗教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爲什麼它們不能更進一步地發展成一個統一體呢？它們尚未達到這一步。也許它們並沒有完全理解它們各自的信息，從而曲解了啓示真理。」（2004：655）其「統一體」，指向某種啓示真理。他認爲信仰不是教條化的東西，應該可以進行對話，發展不那麼嚴格的相互適應性，異中求同。

這個「統一體」可以是什麼呢？起草「世界倫理宣言」的天主教自由思想神學家孔漢思認爲，共通於世界宗教的基本概念並非是「神」，因爲有些宗教如佛教屬無神論，而是真正的「人性」，世界上沒有一個宗教傳統不主張以人道互待，不只是基督教有「金律」，孔子也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伊斯蘭教經典也有類似說法，每一個傳統都可以找到同一個原理的不同表達，這是與其他傳統會通的契機（引自劉述先 2001：21）儒家學者劉述先呼應其觀點指出，我們所追求的是持不同立場的人在「精神上的感通」，理一而分殊，這個理只是一個「規約原理」，不是「構成原理」，指導我們去尋求一個根本原則，如朱子的「月印萬川」的比喻，即使我們在事實上有許多分殊，也可以盡量尋求會通之道（劉述先 2001：20-22）。綜上所言，宗教間的會通不能離開人道原則，或真實人性的體驗。既是「理」的會通，自然無法僅在言語層次上達成，否則極易落入不同宗教分殊的解釋，那麼，會通要如何發生？發生的可能形態和條件爲何？

本文嘗試以台灣慈濟的海外賑災經驗進行這方面的探討。此佛教社群從事國際賑災近二十年，有和不同宗教信徒接觸合作的實際經驗，領導人證嚴法師多年前也提出「大海」的比喻：「宗教之間不應起分別心，要相互尊重、讚嘆；要像大海，無論是江、河、溪、池的水流入大海，都能被包容，這才是正信的宗教。」

「或說：「真正的宗教就像大海，其他的名詞就像溪、河、江、溝，雖然有溪水、河水、井水的不同，其實水都是一樣的。」²其「百川歸海」的寓意似乎更進一層，包括宗教之別只是名相之別，宗教之間並無基本差異，又說宗教的真正精神應如「大海」，基本元素就是「水」，水的象徵十分豐富，包括能滋養萬物，能無限包容。證嚴樂觀看待宗教之間的關係，並非從思想、教理層面的論述出發，而是從指導慈濟擴及世界五大洲的賑災行動，與其他宗教信仰的互動合作中得到驗證，因此值得深入探究其何以歸結出「百川歸海」的譬喻，立足點和關懷所在為何，慈濟推動的跨宗教合作經驗有何特色，對當今宗教對話的課題提供何種視角和貢獻。以下研究資料為證嚴法師的言論，慈濟刊物對海外援助的報導，以及筆者在印尼和南非的田野觀察和訪談所得。

「不傳教」的國際人道救援

慈濟自 1991 年救助孟加拉颶風重災，開始展開國際賑災工作，以人道精神為本，超越政治、種族、宗教及地域之別，宣揚「大愛無國界」的訴求。至今年為止，已累計援助全球六十七個國家，也在近五十個國家成立分支會或聯絡處。國際賑災皆由當地或鄰近國家、台灣的慈濟志工親身到災區勘查所需，採直接、重點的原則，發放物資、義診或協助建屋，並不透過其他組織或當地政府，但並不排除與民間團體，甚至其他宗教團體合作。例如 1998、1999 年曾和基督教的騎士橋國際救援組織 (Knightsbridge International) 共同救援阿富汗和科索沃難民，2001 年 911 事件後，雙方三度合作，「騎士橋」的成員透過阿富汗救援組織的協助，以及北方聯盟和聯合陣線的保護，在戰火威脅下，將慈濟提供的食品、衣物、藥品交到難民手中。難民是伊斯蘭教徒，接受基督教和佛教團體的救援，此也樹立慈濟與其他宗教團體聯合從事國際救援的範例。

慈濟作為佛教團體，何以不排除和其他宗教團體合作？從其救援的訴求看來，可歸因於其濟世志業從慈善起家，所本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法教示，效法菩薩「聞聲救苦」的精神，幫助苦難眾生離苦得樂。另一原因是，證嚴法師創辦慈濟是受到天主教濟世福利事業的啟發。法師曾指出，她離家發心修行，是為「佛經上的文字觸動，起了想追求生命來源去向的心念」，後來在一家醫院的地上看到小產婦人的一攤血，得知其因無錢就醫又被扛走了，她因此深深體悟到人生的苦難，思考「佛陀來人間不就是為了要救濟苦難眾生嗎？」但內心仍有不知要從何做起的疑問。後來有三位修女來找法師。她這樣回憶當時的印象³：

我們相互談論宗教後，我體會到佛陀的教法，真的有一分很入微的慈悲與愛。修女說博愛，我承認博愛的心，對人類真是很用心在付出；但是佛教的

¹ <慈濟道侶>428 期，2003 年 11 月 16 日。

² 出自 2004 年月 9 日證嚴法師對伊朗地震勘災團的講話。

³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3 冬之卷，21-22 頁。

慈悲，不只是博愛，更是大愛，…修女對於佛教的道理，雖然感到佩服，不過她們說：「佛教的道理既然這麼好，為什麼社會上都沒有看到佛教的組織在為人群付出呢？」為了護教，我就回答她們說：「佛教有為社會做事，如果報紙上有提到『無名氏』，這些應該都是佛教徒，因為佛教提倡為善不欲人知。」三位修女說：「雖然是這樣，不過不論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傳教徒從西方來到東方，在台灣興建養老院、醫院、孤兒院，但佛教好像沒有。」那時候，我心想，是沒有啊！所以我的內心非常掙扎。… 所以那一天，和修女說完話後，我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修女們離去後的當天中午，法師就跟一群信眾提到救濟貧困的構想，以做嬰兒鞋的手工收入，加上號召三十位家庭主婦，每天節省五毛錢菜錢成立基金。即使自身生活拮据，法師決心改變帶著少數弟子耕讀的修行生活，立意革新佛教拜懺做法會的消極形象，展開慈善服務，這就是 1966 年成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的由來。

慈濟從慈善工作開始，而後建立醫院，以幫助貧困者醫病，接著又創辦護專和醫學院，以培育有愛心的醫護人員，後來擴充為技術學院和綜合大學，教育體系也向下延伸至中小學和幼稚園。慈濟也運用大眾傳播的媒介資源，出版刊物，製作廣播節目，1998 年成立專屬電視頻道「大愛」，利用衛星傳送到海外諸多地區。後來更發展出資源回收、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等多元志業，正式授證的志工人數至今已達五萬餘人，其他尚在培訓的志工或環保志工也近十萬人。不論慈濟社會服務的項目和志工人數如何擴增，證嚴法師弘法的重點仍在對窮人、病人和遭受意外災難的「苦難眾生」，予以身心照顧關懷，即使在建立教育、人文（原為文化）等志業後，慈善濟貧的急難救助與醫療義診仍居於核心，志工和醫療、教育、人文等志業職工皆被鼓勵參與，也是慈濟成立海外分支會的緣由和工作重點。在慈濟出版的書籍雜誌，或播出的廣播電視節目中，海內外的慈善醫療活動報導均佔最大篇幅。

隨著慈濟海外救援已成常態，救援的對象也擴及不同宗教的信徒，證嚴法師與其他宗教界人士也一直有所交流，建立友誼關係。例如，澳洲布里斯本瑪特醫院院長安琪拉修女曾數度來台訪問慈濟⁴，和證嚴法師雖需透過翻譯溝通，但兩人頗為投契。平常行進保持威儀，鮮少與人牽手的法師，曾和她手牽手參觀慈濟設施。修女表示她也是「慈濟」的一員，因為她贊同慈濟不分宗教、種族的援救精神，她說：「當貧者餓了、凍了，我們要給的是熱食與暖衣，而非頻頻向他們談論宗教。」她肯定慈濟的助人精神，認為以愛才能化解所有的不公和衝突。法師則指出，兩人雖有修女和出家人的分別，然而「我們的心志相同，所走的路目標也相同，可說是『志同道合』。」⁵法師和安琪拉修女兩人的情誼延續至今已近二十年，修女也數度來花蓮，曾表示法師如她親人。今年八月莫拉克颱風造成嚴

⁴ 此醫院為愛爾蘭仁愛修女會所創建，因為當地慈濟志工自薦到醫院當志工，並捐款贊助設備儀器的添購，而與慈濟建立良好關係，如在醫院內設置「慈濟愛心室」，陳列證嚴法師法相、慈濟歷史、佛陀問病圖等；也授與慈濟一席執行董事，每年訂一天是「慈濟日」。

⁵ 《慈濟月刊》420 期，54-58 頁，2001 年 9 月號。

重災害後，修女也發動勸募，為災民祈福，說台灣就如她的家，法師為此很感動說：「宗教雖然不一樣，共同的就是修行的心。」⁶

對受苦難者的行動關懷是慈濟與其他宗教團體合作的依歸，這也是證嚴法師一再提及的宗教共通之處。她認為，各宗教的教主，皆因見及苦難於心不忍，進而去探討、修行，啓悟人間的苦難，知苦而後能解苦。她常強調，全球災難頻仍，如能多一些無私有愛的好人，就有越多受災的人能得救。⁷例如她以信仰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慈濟志工，與信仰佛教的約旦慈濟志工共同為捷克的基督教會贈送座車，也為修女恢復教堂為例，強調說：「各宗教間平常以和氣、互愛相待，當有因緣時則合心、協力去幫助苦難的眾生，若能如此，這才是宗教在人間盛行之道，也才能真正對人生有教育作用。」⁸

證嚴法師並不關心各宗教教義的差異，甚至強調宗教之間的「同」多於「異」，在行動合作中雙方可以「交融」。如 2003 年年底伊朗巴姆市發生規模六點三的強震，慈濟於兩天後派遣八人從台灣運送醫療用品和應急物資赴災區，十一天完成義診和發放；十天後又有另一批醫護人員和志工運送兩千五百噸白米前往。證嚴法師在志工早會中，憶及賑災之初有許多未知數，因為「文化、宗教不同，且對伊朗或中東國家有一點疏離感」⁹。後來在兩梯次的發放和義診中¹⁰，都獲得伊朗伊斯蘭教徒的協助，有人從志工的制服中認出慈濟，因為曾看過大愛電視台在當地的節目；有兩位司機也熱心參與發放，要求也穿上慈濟志工的背心。另有一位翻譯者是大陸甘肅的留學生，是虔誠的穆斯林，工作結束後抱著一位慈濟志工哭了，說很希望穆斯林都是慈濟人，而慈濟人也是穆斯林。證嚴法師轉述這個故事時表示很開心：「因緣很不可思議，所以他們說，但願穆斯林都是慈濟人，我們不分宗教，當然慈濟人也可以接受穆斯林的信仰，我們尊重他們。」¹¹其意表明宗教間應互相尊重，在合作救難中，接納彼此的信仰。

慈濟的國際賑災為慈善服務，並不宣揚佛教，為瞭解災民的狀況和所需，在所屬媒體的報導上，倒常見對不同宗教信仰習俗的介紹。如伊朗巴姆市發生地震後兩個多月，慈濟志工在巴姆東南方的巴拉瓦特市，發放七十噸白米給一千多戶家庭。慈濟月刊的隨行報導中描述：「發放儀式中，眾人依伊斯蘭教的儀軌靜坐，領誦者唸誦了《古蘭經》第七十六章『Ensaan（人類）』——

他們履行誓願，
並畏懼災難普降日……
他們為喜愛真主而賑濟
貧民、孤兒、俘虜……
我們只為愛戴真主而賑濟你們，

⁶ 這段話出於 98 年 8 月 19 日證嚴法師在靜思精舍志工早會的開示。

⁷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5 年春之卷，771 頁。

⁸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3 冬之卷，187 頁。

⁹ 2004 年 1 月 14 日精舍志工早會談話。

¹⁰ 地震後兩年，慈濟持續關懷，發放白米，援建四所女子中學和一所男子小學。

¹¹ 2004 年 2 月 10 日精舍志工早會談話。

我們不望你們的報酬與感謝……

這段經文主要講述人生無常，應及時行善、助人。一位災民說：『歡迎台灣慈濟人再次來到巴姆，自萬里外奔馳到此送愛，將白米親自交到我們手裡，這樣的做法令人感激。若是你們有能力的話，希望能再來這裡，深入我們的生活、感受我們的痛苦。我們什麼都沒有了，不管是醫療或是生活用品；我們的物資和精神都很需要你們的幫助。』¹²這篇報導中也提及，慈濟志工跟隨當地人拜訪萬人塚。因為伊斯蘭教認為，人赤身而來也應赤身離開，並依在世為善為惡接受真主的審判。人死後三天內便要快速簡葬，以白布裹身入土，由於罹難者太多，三、四人裹了白布便匆匆葬在同一穴，下葬人數是巴姆地區四十年來死亡人口的總和。

以上報導傳達災難中人類互助的需求，不論種族、文化和宗教差異的無條件救援；報導也隱然呼應慈濟志工團體內流傳的「見苦知福」與「惜福再造福」的觀念。依據筆者的長期觀察，並參與過大陸賑災和印尼發放、義診，這兩個觀念常被援引為慈濟志工投入國際賑災的精神動力。他們藉見證災難，對生命有更多的省思，對行菩薩道也有更大的體解。另一方面，證嚴法師在闡釋佛法「無常」和「把握當下」的觀念上，也以災難為教育，強調「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鼓勵信眾弟子要從利他關懷中「行經」，而非僅止於「讀經」。

志工在國際救援上雖表明所屬為佛教團體，卻能在不同宗教信仰地區被接納¹³，應和其視服務為修行，即「行菩薩道」，而非宣揚佛教有關。此外，證嚴法師教導信眾要感恩有此機會付出，因人人皆有平等清淨本性，在態度上要尊重災民，同情撫慰其苦難。因此，慈濟志工發放物資的態度模式為彎腰鞠躬，以溫和的言語和行動給予生活和醫療照顧，甚至提供災民信仰所需。2002年元月初，印尼雅加達發生水災，紅溪河氾濫，印尼慈濟志工在災區進行發放、義診、清掃、消毒，並為住在沿岸違章建築的災民蓋屋。2003年7月，一千一百戶的「大愛一村」落成，後又為近出海口的違建戶，建「大愛二村」四百多戶，「一村」內設有中小學、義診中心（現已成立醫院）、商店、工廠、職訓所。顧及社區內九成以上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兩個社區都設置了祈禱室，以及人過世後的淨身處理室¹⁴。此開慈濟在海外義建屋舍，提供非佛教信仰儀式空間的先例。

筆者於2007年1月間到「大愛一村」進行田野訪談時¹⁵，一位中年婦人回憶當初得知要搬離紅溪河畔時，臉上還露出驚恐的表情說：「我很害怕，很害怕，有的鄰居說，慈濟會收買我的信仰，我搬去他們蓋的房子，就要改信佛教。」她

¹² 《慈濟月刊》449期，54頁，2004年4月號。

¹³ 慈濟在海外的救援亦遭遇到不少困難，因為文化、國情差異，據了解常需耐心溝通，讓對方感受到誠意，接受後才能展開救援。也有因為宗教信仰不同，拒絕接受賑濟的情況，如印尼慈濟志工近十年來在當地定期發放大米達八萬噸，曾在有些村莊遭伊斯蘭教長老攔阻，拒絕慈濟進入發放，慈濟也因而放棄。

¹⁴ 慈濟印尼分會負責人劉素美受訪指出，印尼伊斯蘭教禮拜堂一般並無淨身室。慈濟當初設置的原因，是考慮到伊斯蘭教徒依信仰在往生後24小時要入土，這期間親友來禱告送別，公寓房子空間較無法容納多人，淨身室可以「在莊嚴的氣氛下送走亡者，使亡者靈安，家屬也心安」。

¹⁵ 此計畫為國科會補助的「印尼紅溪河整治效應之科技整合研究」整合計畫，筆者負責「宗教會遇經驗」子計畫，執行期間為2006年8月至2009年7月。

也很擔心孩子要上的村裡學校沒有伊斯蘭課程，雖然她去參加慈濟的說明會後比較放心，但還是有疑慮。剛搬入新家時，她只帶了半打盤子和杯子，如情況不如預期就要搬走。後來看到村內確有祈禱室，孩子也能繼續參加祈禱團，念誦可蘭經；學校也依政府規定開設伊斯蘭教課程，穆斯林女老師仍然包著頭巾，才解除戒心。她笑著告訴我們，以前她對「佛教」兩個字感到不安，也怕和慈濟志工接觸，但現在和他們就像朋友一樣。她說宗教教導的都是一樣，都是要有愛心幫助別人。我們接觸的其他村民，包括參與慈濟的志工，也都有類似的說法。

我們訪問了兩個「大愛村」的多位居民，發現慈濟對他們而言，扮演和印尼政府合作，救災建屋的慈善角色，並未影響他們的宗教生活和信仰。慈濟和村民的互動，在宗教信仰方面保持禮敬的距離。村民肯定慈濟志工是「好人」，並未向他們遊說改信佛教。印尼分會成立十多年來負責會務的志工劉素美受訪指出，慈濟志工在當地的救援是人道救援¹⁶，不參與政治，也無所求，尊重對方的信仰，有義診或發放時，會請伊斯蘭教的長老來祈福。她強調：「證嚴上人的法就是說，只要是正信的宗教都是好的，我們讓他們（印尼人）瞭解這點。」負責管理「大愛一村」的志工黃恆贊，以在地經驗告訴筆者，他從不跟濟助對象談宗教，也不強調慈濟之為佛教團體，以免反造成隔閡，因為大多數的印尼人是伊斯蘭教徒，有強烈的信仰歸屬感，在認知上只願意接受「華人慈善團體」的協助。筆者訪問多位慈濟華人志工也得此印象，如一位提及：「在印尼這個宗教多元化的地方，不要認為我們就只是佛教團體，不必說宗教，我們用行動來表示我們的好意，讓人家接受。」印尼的華人慈濟志工也有不少非佛教信仰者，如上面提及的黃恆贊是基督徒，另一位參與慈濟在雅加達水患後援建「大愛村」、亞齊震災後援助造鎮的建築師，義務提供建築設計支援，他說，信仰是「個人的事」，他不在乎幫助不同信仰的人。他因感動於慈濟為災民建屋，幫助他們重生，忘記創傷，自認「為這種愛上了癮」，所以過程再辛苦也值得。

伊斯蘭教徒也未向慈濟志工宣傳他們的信仰，根據一位村內宗教教師的說法，可蘭經禁止教徒勸人改信伊斯蘭教，因為信仰是個人的事，不能因此影響別人產生內心的交戰。我們在「大愛一村」觀察到伊斯蘭教深入影響居民生活作息和態度，如清晨五點禮拜堂即向全村播送催人前去禮拜的祈禱歌，一天之中其他四個時辰（中午十二點，下午三點、六點、七點）亦播唱頌歌，提醒人禮拜的時刻已到。在村內的宗教教育方面，約十位的宗教教師（Ustad）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宗教知識、人生和道德問題解答，督導村民定時禮拜，言行態度合乎可蘭經的指導。他們且各自分區帶動夜間的祈禱聚會（各區至少每週一次），在家義務指導唱頌阿拉伯語的可蘭經，這被視為伊斯蘭教徒的必要功課，參加者從兒童到青少年都有，顯示宗教教育不只學校重視（學校宗教課程屬必修，如成績差要留級），在家庭和鄰里社區亦受到重視，延續數百年的伊斯蘭教傳統對社區生活的影響依然明顯可見。

¹⁶ 在興建「大愛村」以前，慈濟在印尼的援助主要是發放米糧和義診，已進行近十年。

然而，在我們三度赴「大愛一村」進行田野調查期間¹⁷，都見到村裡婦女穿著慈濟志工藍上衣白長褲（名為「藍天白雲」）制服，包白頭巾的身影，形成信仰共容的鮮明景象。以下將進一步描述分析不同宗教信仰者為何參與慈濟的志工服務，其中反映宗教間的合作在人性的關懷，以及各自的信仰脈絡中如何可能發生。

非佛教信仰的慈濟志工

我們在「大愛一村」、「大愛二村」各訪問十位和三位參加慈濟志工服務的穆斯林婦女¹⁸，她們參與醫院病患陪伴（包括一般的醫院和「大愛村」內的慈濟附設醫院）、訪貧、訪問孤兒院和老人院，或協助義診、急難救助、發放大米。依他們和華人志工所述，這些服務大部分是跟著華人慈濟志工做，也有些是為後者鼓勵自行從事，例如配合公共衛生和醫院宣導健康常識（如肺結核防治），發放慈濟提供的奶粉給營養不足的孩童，或是在村內設置的環保站做資源回收。有七八位穆斯林女性志工因為較熱心投入，也被邀約參與成為慈濟委員的培訓課程，開始捐款、勸募，儘管她們都表示並不期待、或夢想有一天會去台灣接受證嚴法師授證成為正式的委員，因為機票和委員制服費用非她們所能負擔。

在回應為何願意做慈濟志工，且穿上慈濟志工的制服時，她們舉的理由包括：回報慈濟的關懷協助、從助人中得到快樂、增廣見聞、結交新朋友、對自己的生活較容易滿足感激、生命比較有意義、喜歡慈濟志工的「藍天白雲」制服等等。和筆者對台灣女性慈濟志工的觀察所得相仿，慈濟拓展她們的生活空間，也增加她們的自我價值感和生活品質。她們和信仰佛教的慈濟志工（亦以女性居多）共事的基礎，較屬類似的性別角色經驗和精神情感的需求，尤其是後者。例如，一位「大愛二村」的女性穆斯林志工指出，她在慈濟體會到不需要有錢也可以助人，尤其到二村關懷的慈濟師姐很和藹親切，沒有因為開好車，經濟狀況不錯，就看不起她們，而給居民「全心的愛」。所以她願意跟隨，甚至主動聯絡慈濟，協助村內中輟生到一村的慈濟學校就讀。

這位穆斯林婦女也提及，她到「一村」的志工訓練學「一家人」這首歌時，感動的哭了，覺得「被整個慈濟接受，成為一家人」，她也教二村的小孩這首歌，說「如果全世界的每個人都跟唱的歌一樣，就不會有衝突了」，顯示她們很看重在慈濟所受到的接納和尊重。同樣地，有一次我們同時訪問「一村」的五位婦女，得知她們也學了慈濟的手語歌，請她們表演時，她們也唱起印尼文的「一家人」，邊比手語，有的說：「慈濟歌曲很感人，無法用言語形容。」有的說：「生活碰到

¹⁷ 筆者和本計畫助理汪忠良（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研究生）於 2007 年 1 月底、2007 年 7 月初、2008 年 7 月中赴雅加達進行訪談，每次停留七天至十天。訪談翻譯者為總計畫的當地助理 Dwi，她是印尼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畢業生，可將印尼話用流利的英文加以翻譯。

¹⁸ 「大愛一村」居民近三千五百人，參與過慈濟志工服務的穆斯林以女性居多，約有三十位，男性志工有兩位，因為男性村民忙於生計，工作不穩定，而女性村民多為家庭主婦，較有閒暇參與志工服務。

問題時，聽慈濟歌會覺得很感動，得到撫慰。」這首歌不是佛教歌曲，辭意表達人與人間宛如家人般的溫馨關懷，曲調溫柔感性，幾乎已成慈濟海外賑災最常表演、帶動唱的歌曲，顯然因此拉近了助人者與受助者，以及不同信仰、族群與貧富階級的距離。

這是人情關懷的吸引力。此外，她們參與慈濟背後也有宗教的信念支持，常常提到「阿拉」或「神」，如說「只要不被要求改宗，阿拉也會很高興看到祂的子民助人」，「幫助別人會得好報，神會給我們健康長壽，給我們永恆的生命」。她們的信仰也有類似於佛教中的「業報」或「功德」觀念，如相信做善事會得好報，死後會有較好的去處，做慈濟志工有助於她們得善報。有幾位穆斯林婦女甚至表示，她們「做慈濟」後對阿拉的信仰更堅定，因為從助人中體會到信仰的真義。有人提到慈濟華人志工教她如何耐心關懷他人，雖然所信的宗教也說要有耐心，但她是在慈濟的志工活動中才真正受到訓練，脾氣也由過去的易怒而變好許多，心情也變得開朗，不會在乎別人的閒言閒語。

目前是村內穆斯林女性志工的領導者蘇菲，幾乎每天清晨即起，為家人煮好食物後，搭一小時的車到鄰鎮醫院做志工。她以前教瑜珈，原本可以利用星期假日賺點外快，但為了參加慈濟活動，也放棄賺錢的機會。她對慈濟的熱衷和對信仰的熱衷似乎結合在一起。她說：

未參加慈濟前，我沒有每天都祈禱五次，常常會忘記，自己找藉口說沒時間。

參加慈濟後，證嚴法師的靜思語時常提醒我阿拉和生死的事，我感謝阿拉給我健康和福祉。在慈濟，我感到和阿拉、我的宗教更接近。

我們第二次訪問她，是在她和眾多華人志工、近十位穆斯林女性志工參加「精進日」研習，也跟著繞佛（慈濟現稱為「繞法」）後，她對繞佛行進的感受是「把心靜下來」，穿上藍衣就很讓她感動，覺得責任越來越重，也願意去承擔。當被問及是否會被佛教影響時，蘇菲很堅定地說：「我信仰就是信仰，做慈濟就是做慈濟，我非常有自信，上人講的道理非常符合我的做法跟想法，她教的和我們宗教都一樣。」她特別提到很認同證嚴所說「行善和行孝不能等」，健康的時候就一定要去做，「分秒不空過」。

蘇菲所引用的證嚴法師「靜思語」，是由印尼慈濟志工摘錄翻譯其中未涉宗教教義，屬於「道德品格」和「人際倫理」的部分，共一百零八條印成摺頁小冊，在村民參與的志工活動中贈送。印尼分會負責人劉素美說：「我們並不刻意教他們，免得他們有防衛心。如果他們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們就用上人靜思語解釋給他們聽，建議他們可以怎麼做。」她也指出，活動中也會播證嚴法師的開示錄影帶，「我們告訴他們，這是我們師父的慈悲，教我們怎麼做，我們才會這樣做啊！才會建『大愛村』。」慈濟在「大愛村」內辦的中小學開設一門「慈濟人文」的課程，教材即為「靜思語」，劉素美將之定位為「道德品格教育」，包括生活禮儀。筆者曾參觀小學這門課的教學，老師要學生將背包轉到胸前，體會母親懷孕的辛苦，由此教導孝順的道理。一位曾教過「慈濟人文」課程的伊斯蘭教宗教教師告訴我們，這門課和另外的宗教必修課（依學生信仰分班）分開上，他提醒孩

子，兩種課程都是一樣的價值觀，都是關於道德的問題，如「對家長有禮貌，為別人做好事」。

靜思語作為道德教材，也間接使得村內穆斯林女性志工對慈濟更認同。如蘇菲提到其三個子女在村內慈濟中小學唸書，回家會跟她提起「如何發揚大愛」的話題，引用「靜思語」，她遇上不懂的「靜思語」，也會問孩子老師如何解釋。子女支持她常一早就出門做志工，會體諒她而自動自發分擔家事，也會跟她表達慈濟宣揚的「感恩」，而她也會跟孩子道感恩。先生在接受我們訪問時提及，看她脾氣變的溫和，也從原先的反對轉而跟著參與志工服務。蘇菲很欣慰家庭關係很和諧，在我們相隔一年半的兩次訪問中，她顯得對慈濟更加投入。

其他受訪的穆斯林女性志工也認為這一本「小書」很有用，是「生活的指南」，不像可蘭經較偏知識性。她們強調「靜思語」提醒她們伊斯蘭的教義，說兩者間有甚多相似，如保持環境清潔，還有「行善就像在天堂，行惡就像在地獄」。另一位看過「靜思語錄」的一村宗教教師也有類似的說法：「我們成為伊斯蘭教教徒已經這樣久了，但是我們沒有這樣的紀錄在書中，沒有像靜思語這樣能在生活中實際使用的方法。」他肯定「靜思語」教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為善，也支持村民跟著慈濟志工參與災難救援、醫療服務，他說：「如要和上帝有聯繫，也要跟他人產生聯繫，做志工幫助他人可以更接近上帝。」

慈濟兩年前在雅加達成立「大愛」無線電視台，每天播放證嚴法師在台灣開示影片，兩個「大愛村」的女性志工常看此節目，對法師多所讚美推崇，如說：「上人的表情很祥和，和農夫一樣祥和。上人像是有收成的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享受到成果，上人很誠懇地給大家。」「這個國家、這個世界有很多問題，但是上人都冷靜地對待，令我們感到平和，我覺得沒人能跟證嚴上人相比。」「上人能夠把愛心發揚光大，她是一個偉人，一個慈善家。」這些話反映，她們對證嚴法師的印象不是佛教法師，事實上，她們對佛教也不瞭解¹⁹，而視法師為具濟世大愛的慈善家，受其慈善的德行風範所感動。此顯示法師對於展現人性大愛的身教說服力不只對華人佛教志工如此，在慈濟國際救援中，也能突破宗教藩籬，影響其他宗教信仰徒加入志工行列，這顯然是宗教會通重要的著力點，以下還將提到一些例子。

在雅加達，奴魯亞伊曼習經院的師生也參與慈濟志工服務。這座習經院由穆罕默德後裔沙格夫哈比創立，主要收容自小學高年級至大學的窮困人家子弟，免費提供教育和膳宿。印尼慈濟基金會經印尼社會福利部轉介，自2003年起每月濟助五十噸的白米，後來學生從三千增至八千人，2008年7月已達一萬三千人，濟助也增加至七十五噸。慈濟志工協助習經院自立更生，如開麵包坊和豆腐工廠、種蔬菜、種稻，另外協助興建校舍、鑿井、義診，並傳授資源分類回收和衛生教育。哈比長老為感謝慈濟，主動表示希望有所回饋，鼓勵學生參與慈濟志工服務，如2007年2月雅加達發生嚴重水災，習經院出動六百位學生加入慈濟的

¹⁹ 例如有位「二村」的穆斯林志工問筆者：證嚴法師是男性或女性？因為在印尼，女性不會是光頭。顯見她對佛教出家人以剃髮和在家人區別一無所知。

賑災和清掃工作。後來學生也輪流到印尼慈濟分會參與志工培訓，坐在有佛像的講堂中聽慈濟志業的介紹²⁰，參與慈濟的義診和賑災活動。

哈比長老曾在國外講學過，是位宗教教育家，其理想是培育學生將來也成爲教師，甚至到印尼各地成立習經院，提升民眾的知識教育水準。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也讚賞「靜思語」，表示已作爲習經院道德教育必讀的教材，因爲可蘭經是需要研究分析的知識性書籍，不易懂也不易教，而「靜思語」沒有教條，很容易接受。他也認爲證嚴法師的話和可蘭經內容相似，如提到「靜思語」所言「不要低估自己，人有無限的可能」時，他馬上提出可蘭經的對應說法：「不要批評或看輕其他存有物，即使他多麼渺小，人類被創造時是美麗的，無論遇到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他更高度推崇證嚴法師，形容法師「有純淨的心，純潔的生活，不會被物質世界所影響，做的東西很誠懇，是發自內心的，也可以講出很多激發人的好話。」「不干涉別人宗教，只希望別人有更好的生活，立場中立。」甚且將法師比喻爲神所揀選的天使「蘇菲」（有純潔的心和靈思），蘇菲不一定是伊斯蘭教徒。他自認只是一位老師，以法師爲學習的典範。他曾參加印尼慈濟志工音樂手語劇「父母恩重難報經」的演出，也參加過慈濟在當地的浴佛活動。在他一再地要求下，向慈濟要來一幅法師的照片，懸掛在習經院行政辦公室，後來又要求每個教室都掛。帶我們參觀教室時，我們發現證嚴法師的照片和他的照片左右並排，他向我們解釋說這「代表宗教和諧共事」，且盼望有一天能到台灣拜訪法師。

從印尼穆斯林志工和哈比長老的話中，我們發現，穆斯林受濟助者也成爲慈濟志工，是因接受慈濟與其信仰相通的道德觀，以及對助人善行的共鳴，其間有相當部分是出於回饋心理，如提到：「外國人都來幫助自己的同胞，自己怎能不加入？」，或出於人情上的共融，或出於其宗教信仰。慈濟開放性的行善場域，提供他們實踐信仰的機會，成爲更好的教徒。不同宗教信仰的共事，都未觸及不同教義信仰的討論。即使哈比長老作爲宗教領袖，對證嚴法師的興趣也遠大於對佛教的興趣，甚至將法師形容爲伊斯蘭信仰體系中的某種非凡的典範。

從另一個角度看，慈濟雖不傳教，但傳播淡化佛教色彩的「靜思語」，所以未受到排斥，是因其大抵不離做人修養、孝順、行善的主題，頗能引發人性倫理的共鳴，甚至作爲當地學校「道德品格教育」的補充教材。此外，「靜思語」具有爲善的行動取向，其傳播的方式並不限於書面文字形式，常是透過慈濟華人志工的口語傳播，先是其行爲受到肯定，靜思語才落實其影響力。如前面提過，印尼分會執行長劉素美告訴受濟助者，慈濟志工如何在證嚴法師的教導下展開種種救濟。在鼓勵受助者加入助人行列（例如捐金額不拘的善款）時，她常引用法師的話，如「做手心向下的人比手心向上的人更有福」（施比受更有意義）、「世上多一個好人，就少一個壞人」、「做善事是在祝福自己」、「做善事不能少一個人，

²⁰ 筆者沒有機會參與觀察這些穆斯林坐在佛堂內的訓練活動，但曾在習經院的禮拜堂訪問一位女學生，她也參加過慈濟的志工培訓。她說哈比教長曾告訴學生，如果信仰夠堅定，就不會被其他宗教影響，穆罕默德也會保佑他們不被影響。此外，慈濟志工也告訴筆者，她們告訴穆斯林志工，不必跟著禮拜佛陀相，只要拜他們心中的神即可。這個說法筆者也從一些訪談的穆斯林女性志工口中得到證實。

集合眾人的力量就可幫助很多人」。她和印尼分會的副執行長郭在源在受訪時都強調，慈濟期望帶動當地人一起幫助自己的同胞，促進受助者也成爲助人者的「善的循環」（也是證嚴法師的話），因爲人人皆有善念，可以利用機會加以啓發，而且要改善貧窮問題需靠本地的力量，受助者也需自立更生。

在我們的訪問中，這些觀點可說是華人志工，甚至是其他海外地區慈濟志工的共識。如一位從馬來西亞前來印尼協助會務的資深志工說：「我們要長期培養因緣，希望他們慢慢能瞭解。我們慈濟付出無所求，如果有求，是希望他們能夠變好人，有愛心，去幫助別人。不管他們是用他們的宗教，都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你真的要變成這個樣子。你證明你在慈濟看到，回教本來就有這個教義，你應該去實行它，去做。」他認爲講慈濟不一定是傳教，許多穆斯林志工參加慈濟的培訓課程，瞭解慈濟的各種濟世服務和故事後，都很感動，說他們「來慈濟看到回教」，看到「真主的教義」。和幾位伊斯蘭教志工的說法類似，慈濟的宗教合作是以各大宗教看重的愛的付出行動爲共同基礎，這點也被非佛教徒志工用來自我說服，避開信仰有所歧異的矛盾心理，以下便是一例。

在印尼之前，慈濟海外第一位穆斯林志工是土耳其台商胡光中。他信奉伊斯蘭教，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發生之初，曾投書台灣媒體，發出「救援土耳其，台灣在哪裏」的疑問，那時慈濟已派志工前往災區瞭解災情，便與他聯繫，胡光中因而參與協助慈濟的救援工作。慈濟在當地爲災民建屋，爲了持續關懷居民，2000年元月土耳其成立慈濟聯絡點，由胡光中負責。他帶領華裔留學生、台商及土耳其籍志工，每年在齋戒月前做大型物資發放，也提供急難救助或長期資助，後來成爲第一位經證嚴法師授證爲「慈濟委員」的穆斯林。

胡光中曾表示，在土耳其推動慈濟志業，他內心也曾自我質疑算不算是宗教叛徒，他思考後得到以下結論：

我做慈濟並不違背我的宗教。我的宗教教我的，不就是要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嗎？……我許多朋友也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們也都贊成我目前所做的。…我認同上人所說的：宗教其實是大同小異…，心大就同，心小就異。這世界上就是有太多人在分彼此，分完你是什麼教之後，再分你是哪一派的。²¹

這是他有一年回台參加慈濟週年慶活動的感言。他說當時只在後頭觀看志工的佛教禮拜儀式，但慈濟超越宗教、種族的「大愛」服務行動，讓他覺得自在。在浴佛典禮的大迴向時，他也受莊嚴的氣氛感動流淚。他說，浴佛前人人要洗淨雙手，就如同回教徒在每天五次禮拜前一樣需清淨身心。他自己在活動期間，也會選擇安靜的角落，虔誠進行回教禮拜。²²

胡光中因生活在有火藥庫之稱的中東，對戰爭的殘酷和衍生的仇恨感受深刻。2001年9月11日美國世貿大樓被攻擊爆炸後，他在電視上看到約旦河兩岸老百姓歡欣鼓舞的畫面，感慨正信宗教不會教人去做恐怖自殺式攻擊，看到這麼

²¹ 《慈濟月刊》423期，39頁，2002年2月號。

²² 《慈濟月刊》426期，46頁，2002年5月號。

多人命傷亡還幸災樂禍，這是出自仇恨，而非宗教的緣故；更早幾天晚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飛彈不會停止轟炸，使人們因而產生仇恨的心理。他說：「我愛慈濟也愛阿拉，因為我知道那之間沒有衝突抵觸。《古蘭經》教導我們要『為善競爭』，要我們原諒敵人。感恩證嚴上人也要我們『以愛化解仇恨』，因為多少例子顯示：仇恨只會加深仇恨，唯有愛才能讓這世界充滿光明。」他希望美國人能放下報復心理，將那些用於對阿富汗的作戰武器，轉為給難民的醫藥糧食，也自許「在缺愛的中東地區撒下愛的種子」²³。他融合伊斯蘭教的「原諒」和佛教「無緣大慈」的「大愛」精神做慈濟志工，強調「我愛慈濟也愛阿拉」。

揉合不同宗教的信念助人，同樣也見於南非祖魯族的黑人女性志工。她們原都是貧困的受助者。1993年南非台商潘明水加入慈濟，邀集一些華人在當地濟貧。為了協助貧戶改善家計，推動開辦裁縫班，至今已成立五百二十四所這類職業訓練所，提供一萬四千多名祖魯族婦女習得縫紉技能謀生。另外，慈濟志工也協助貧窮社區開闢社區農場，生產農作物，自給自足外販售增加收入。由於南非黑人白人貧富懸殊，加上四千萬人口中，愛滋病帶原者就有六百萬，造成許多社會問題，許多祖魯族黑人男性早逝，平均年齡39歲，留下女性獨力撫養兒女，而成為貧窮的弱勢，父母如雙亡，也留下許多愛滋孤兒，送收容所，或者隔代教養。慈濟志工面對這種問題，決定訓練職訓所的祖魯族婦女成為志工，向她們宣導如何預防愛滋病，帶領她們關懷社區。至今南非在德本、約翰尼斯堡、雷地史密斯等市鎮已有一千六百多位當地志工，照顧的對象包括六百多名愛滋病患、兩千多位孤兒和五百多位重病患者。

筆者曾於2000年利用到德本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便，參與當地慈濟活動，跟著華人志工帶著一群黑人志工，行經荒涼貧瘠的黃土地，到偏遠村莊發放物資。當時所得的印象是，這些婦女多有不幸的際遇，受到慈濟的關懷後，也願意協助華人志工照顧其他苦難者。她們很清楚南非因長期種族隔離，社會弱勢族群亟待救援，感同身受其困境。根據當地德本台僑志工的描述，祖魯族婦女是當地志工主力，和華人志工的比例是一百比一。黑人志工進入貧民區關懷為貧窮和疾病所苦的人，由於治安差，掠奪謀殺的事件時有所聞，路上也曾遇搶，但她們仍冒險奔波在幅員廣大的窮鄉僻壤。有祖魯族志工甚至設數十個供食點，自行採購，在自家煮好後，分送到社區有需要的人家，而她們當中許多人沒有工作，靠領取政府補助金度日²⁴。潘明水形容她們是「以貧濟貧，難行能行，難捨能捨」，由於她們天性樂觀，喜歡唱歌跳舞，隨時隨地都可以唱唱跳跳，一路哼著歌來到病人家裡，也抒解了病患的苦悶。祖魯族志工幫忙打掃環境，為愛滋病患洗浴，甚至為末期病人清理水瀉的穢物，更換床單²⁵。

祖魯族婦女志工在慈濟內部被稱為「黑人菩薩」，近幾年來，她們在南非走崎嶇山路，關懷重病者的影片紀錄屢屢在慈濟志工研習活動中播放。由於她們體

²³ 《慈濟月刊》419期，3頁，2001年10月號。

²⁴ 《慈濟月刊》477期，88頁，2006年8月號。

²⁵ 同上，90-91頁。

型多胖，跋山涉水似乎頗為吃重，但這些穿著「藍衣白裙」（南非已婚婦女依習俗不能穿長褲）的慈濟志工一路唱著歌，饒有韻律的擺動身軀行進，常要走上兩三個小時的路。彷彿也為自己打氣，她們編歌，用祖魯族語唱著：「上人的愛溫暖著我們，上人的愛保護著我們，讓我們不怕任何困難！」或「慈濟的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慰問病人，為她們按摩、淨身時，她們有時吟唱「哈利路亞」，有時又唱「阿彌陀佛」，似乎要給予雙重的祝福和力量。她們也唱：「我要去台灣——當世界末日來臨時，上帝來帶我。我說，我要去台灣，因為台灣帶給我希望……」²⁶潘明水說，她們盼望證嚴法師能去南非看她們，得知法師無法長途飛行後，她們又編了一首歌：「在台灣的上人，您抓住了我們的心，我們好愛您，我們發願要去台灣看您。」近三年來每年都有將近十位來台灣，參加海外志工研習營，並穿上旗袍，接受證嚴法師授證為委員²⁷；在研習活動中，她們也常載歌載舞，表達參與慈濟的熱情；在慈濟較沈靜的活動氛圍中，注入活潑的異文化氣息。

這些南非婦女是基督徒，也保有祖魯族的傳統信仰，講的是族語方言，需透過少數會講英語的人翻譯，也鮮少接觸慈濟刊物，收看不到大愛台。對處於社會下層的祖魯族婦女而言，慈濟是協助她們走出生活困境，帶給她們重生希望的慈善濟助團體。她們唱「阿彌陀佛」並非表示要皈依佛教，而是跟著華人志工講的祝福語；受證為慈濟委員，也未被要求成為佛教徒。許多志工是因受到慈濟的幫助，心生感激而回報。如最早加入慈濟，2006年受證成為第一位黑人委員的葛蕾蒂斯，原本是遭逢婚變，充滿怨懟的單親媽媽，潘明水等台僑志工到她的村莊發放後，幫助她走出陰影，帶她做志工，她也以自身經歷輔導失婚或未孕懷孕的婦女，鼓勵她們做志工。由於會講英文，她也成為台僑志工和祖魯族志工溝通的橋樑。又如有些愛滋病患自承原本「像是被貼上標籤，總是要躲躲藏藏」，被慈濟接納後，「打開心胸，坦然面對自己」，參加志工研習，願意穿上「藍天白雲」制服，以同理心服務愛滋病患²⁸。

早年發放時，許多當地人認為慈濟志工是上帝派來救他們的天使²⁹，視潘明水是「聖誕老公公」，可以從他那兒得到好處。潘明水則灌輸她們新觀念：「我帶來的禮物只有一樣——那就是愛。這份禮物無法實質改善生活，卻可以啟發精神，幫助我們用知足、感恩的心面對生活，用善解和包容的態度面對不如意。」³⁰所提「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是證嚴法師提示信眾的處世之道，被慈濟志工廣泛通稱「四神湯」。祖魯族志工漸漸從台僑志工口中認識證嚴法師，對法師的敬仰有加。她們獲贈有著證嚴照片的佛珠後，也學華人志工戴在手腕上，以此表示對慈濟的認同，甚至視之為「護身符」，期待得其庇佑。如葛蕾蒂斯有一次遇搶匪，對方沒對她動手，她後來告訴潘明水：「我當時心裡想的是上人，我相

²⁶ 《慈濟月刊》493期，141頁，2007年12月號。

²⁷ 由於她們經濟情況不佳，來台的旅費多由當地台僑贊助。

²⁸ 《慈濟月刊》477期，89頁，2006年8月號。

²⁹ 《慈濟月刊》477期，95頁，2006年8月號。

³⁰ 《慈濟月刊》477期，95頁，2006年8月號。

信上人會保護我。」其母也曾被洗劫，對著手上的慈濟佛珠合掌禱告後，歹徒打消要加害她的念頭³¹。這聽來近乎神秘經驗的故事顯示，證嚴法師是鼓舞照護她們的精神力量。又如在發放物資給貧戶時，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黑人志工舉行宗教儀式，唸完聖經後，也會唸「阿彌陀佛」，或者用四部合唱稱念佛號，並用族語和英語為法師祈福，唱道：「如果我們沒有做到上人教我們做的事，往生後我們的神會問我們為何沒有背負起使命。」³²顯示她們視證嚴法師為「信仰實踐」的教導者。

和印尼雅加達的情況一樣，慈濟華人志工傳播法師的「靜思語」，如一位雷地史密斯的華人女性志工指出，他們跟祖魯族志工不談佛教，只談做人的道理，介紹證嚴法師對於「為善」的教導。她早年從台灣移民到南非，1995年加入慈濟，先生於1997年結束事業，做專職志工，夫妻兩人一起在雷地史密斯帶領祖魯族志工³³。依其觀察，這些婦女原來認為自己很窮，但看了照顧戶之後轉而珍惜自己所有，對於「這麼多人可以集在一起可以做這麼多事」感到有成就感。由於祖魯族婦女天性純樸，從助人中得到快樂，這份快樂也在她們之間互相傳染。她和這群當地婦女已情同姊妹，被當作家人一樣對待，如遇到困難時，她們會一起來安慰、擁抱她，也會在路旁等她大半天，只為了送她玉米，令她十分感動，雙方的情誼建立在長期人情的陪伴和共事。

由於台灣人在南非從1992年的五萬人，至今減少到只有八千人，她也預見自己有一天將告老還鄉，慈濟的服務勢必由當地志工接棒³⁴。她說：「我們沒有以施捨的姿態，時間久了，她們都會感受到誠意。我們並不期望這些祖魯族婦女都能成為『慈濟人』，只希望增加她們愛的力量，幫助他人。」在雷地史密斯，台僑志工已協助成立幾所中小學，為學校募集教科書，也成立獎助學金，培植到大學畢業，她期望這個教育的投資，將來可以由受助者推動在當地的救濟工作。

以上所舉為印尼和南非兩地，伊斯蘭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慈濟做志工的例子，顯示宗教信仰的差異並未造成志工共事的阻礙，各自教義信仰的內涵也未成為話題，宗教信仰也許不是他們行善的最初原動力。較多的情況是人性中惻隱之心的發露，對行善助人的共鳴，以及受助者的人情回饋。由於志工服務的對象是貧病者或災民，助其脫離苦迫困境為首要之務，救援行動需借當地人的助力，宗教信仰不同成為次要的、個人的事。慈濟國際人醫會是另一明顯的例子。此醫療服務的次級團體於1996年成立，成員平日在居住地服務，有需要時應邀參與慈濟在落後地區或災難後的義診，甚至常常跨國義務支援³⁵。筆者曾參與「人醫會」在

³¹ 同上頁。

³² 《慈濟道侶》406期，1版，2002年12月16日。並參《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2年冬之卷，頁。

³³ 其夫是慈濟南非分會的副執行長，夫妻於今年4月23日到筆者「慈濟經驗專題」的課堂上談志工心得。

³⁴ 南非最資深的台僑志工潘明水已於2007年返回台灣長住，陪伴年邁雙親。爾後每三個月才回南非探望當地志工。

³⁵ 「國際慈濟人醫會」以「醫病」、「醫人」、「醫心」為宗旨，成員為醫護專業志工，迄今有七千人加入，在11個國家設有58個聯絡點，總共在40多個國家提供醫療服務，服務總人數超過

印尼雅加達的義診志工服務，數十位包括在地和鄰近國家的醫護人員，在三四天內，密集為數百上千的貧困者診治和開刀（如甲狀腺、白內障、牙病、疝氣、腫瘤），慈濟志工在旁扮演陪伴關懷病患的角色。除了義診開始前請伊斯蘭教長老帶領禱告，安撫病患在等待就醫前可能的焦慮不安外，並無其他宗教儀式。由於病患多，所有志工不問社會與宗教信仰背景，以解除病苦為共同目標。

雖然如此，宗教信仰在不同程度上，或直接或間接扮演支持或強化助人情懷的角色。那麼，慈濟在海外與不同宗教信仰者的行動合作，如何關係到當今「宗教合作」或「宗教對話」的課題？其經驗建立何種宗教對話的模式？與全球倫理議題可以進行何種交流對話？在理念和實踐的考察後，證嚴法師所說「真正的宗教如大海」如何被理解詮釋？「大海」的意象指涉為何？以下將做進一步討論。

宗教合作的契機

每一文化對災難何以發生多半有其信仰上的解釋，對受害者的撫慰和心理治療也多藉助宗教的無形力量（王純娟 2006，丁仁傑 2003）。宗教的影響力不只在於面對與接受苦難，也在於對遭受苦難的人伸出援手（林美容等 2004），如何幫忙解決當今人類所受到的天災人禍苦難、人類製造的環境危機，可說是所有宗教被期待要面對，尋求溝通與合作的課題。宗教對話學者保羅尼特（Paul Knitter）指出，由於苦難正在耗竭生命、危及人類和地球的未來，這一普遍性、緊迫性的全球處境已經超越了文化和宗教的種種差異，觸動了所有人，不同宗教追尋者確實經驗到一種共同的關切和責任，須對人類和生態普遍的苦難與非正義做出回應，使得「宗教間新的相遇既必要又可能」，因此「苦難的他者好像成了不同宗教世界之間信賴和理解的中介或通道」（2003：19, 93-95）。雖然各宗教在如何解決苦難的問題上意見不一，但因「苦難太直接，不能被上百種解釋所窒息」，宗教對話可以就共同的倫理承諾和行動闡明共同基礎（2003：147-148）。

這共同的倫理承諾從何產生？在尼特綜合許多學者的討論中，指向「人類的共同經驗」或「人性的相似」，而非從教義或儀式的對話去找尋。他說：「在我們實際作為宗教人士相互交談前，一種生存論上的人性關連已經存在，已經在起作用。」（2003：232-233）他引用 Michael Amaladoss 在印度觀察的經驗指出，不同宗教共同體的人會發現為一種非明確屬於宗教的力量統一起來，在一種召喚下聚集在一起，「這種召喚來自受難者和邊緣人的呼喚」，他們被召做事，患難與共的感覺會日益增長。Amaladoss 也指出，「宗教間對話必須從專家層面下降到普通人也即窮人的層面。表現在象徵、手勢和共同的活動中，而不是在抽象的討論中」（1992：166,172，引自 Knitter 2003：229）尼特也引 Maguire 的觀點說，有些學者竭力想找出諸宗教的「共同本質」，但經常看不到諸宗教相遇的「道德共域」，因為他們太早引入關於上帝的談論，Maguire 說：「不能增進人類和地球福祉的絕不是神聖的。宗教只能植根於真誠的道德意識。基本的道德經驗是宗教經驗的基

一百萬人次。

礎。」(1993:39, 引自 Knitter 2003:170) 尼特因此強調, 在共同面對苦難的問題時, 正行的實踐比正信更加重要, 在宗教生活中是崇拜或儀式居於優先, 但在明白和感受崇拜的對象時, 則是倫理優先(2003:170)。行動的對話或負起全球責任的對話, 比其他形式的對話(如神學交流或宗教經驗的對話)更有緊迫性和可行性, 宗教間相互理解的所有努力應以共同消除生態—人苦難為目的的實踐為先導。

行動的對話是行動合作, 這是宗教交談與合作一般所接受的四個領域之一, 其他三個領域為生活的交融、宗教經驗的分享、宗教思想的交流(房志榮 1999)。行動對話的場所不是在會議室內, 而是在消除災難的行動過程中。雖然尼特等學者認為此類對話不從教義上的交流出發, 但他們都強調, 當宗教徒在投身於關心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實踐行動時, 會“重新聆聽”或“重新審視”他們的經典、信念和故事, 反思他們的宗教遺產時, 會發現從舊的財產中“帶出了新的財產”。如 Schillebeeckx 所指, 通過正行, 我們又能夠用新的語言來宣信和表達一個可信的和有活力的正信(1990:83, 引自 Knitter 2003:235)。或如 Gort 所指, 在實踐和團結的熔爐中, 宗教信仰、觀點和經驗得到檢驗, 並被賦予更深、更廣的意義和背景(1991:73, 引自 Knitter 2003:236)。

以上學界對宗教對話—合作的觀點, 相當能解釋慈濟海外的志願服務何以有非佛教信徒前來參與, 尤其是受助者也成為助人者。其動力出於人性中的惻隱之心, 貧病和災難等各種苦迫會令人感同身受, 不忍坐視不顧, 及尼特所謂「生存論上的人性關懷」, 慈濟以尊重與協助苦難者的行事倫理, 加上「做好事」的場域氛圍獲得響應。原本各大宗教傳統就教導友善、愛和慈悲的道德理念, 也是核心理念(Hick 2003:371), 慈濟的志工服務提供不同宗教信仰者信仰實踐的機會, 如上節穆斯林志工所指, 參加慈濟後, 從助人中體會到信仰的真義, 對阿拉的信仰更堅定。他們選擇證嚴法師的話或書冊形式的「靜思語」, 將其中的道德理念融入自身宗教信念中, 發現其中相通之處。本研究資料也顯示, 有華人佛教志工從穆斯林志工的虔誠與專注, 或者從南非黑人志工「難捨能捨」的熱誠付出, 反身自省信仰實踐的用心, 這一「重新審視」經典和信念的過程在宗教「團結的熔爐」中發生, 宗教間的相遇與合作, 激發出各自宗教在傳統領域可能未見的活力, 包括信念力和行動力。

苦難是慈濟與其他宗教合作的契機, 從人道救援立場, 有無宗教信仰顯然並不重要, 慈濟所說的「不傳教」, 可說是單一目的取向的附帶聲明。但合作得以形成召喚力量並延續, 有證嚴法師的一套信念為後盾, 由此產生慈濟的救援模式。這套信念和作法非限於佛教, 精神上指向宗教學者所提的「百川歸海」意象, 凸顯既是宗教關懷, 也屬人性的共通性, 以下將析論此譬喻在慈濟跨宗教合作經驗中的多元涵義。

「百川歸海」的多元涵義

慈濟跨宗教、跨文化合作的信念基礎是人性清淨論，即證嚴法師從佛教觀點所提的人性論：「不分宗教、不分種族、不分國界，也不分文化，即使語言不通，只要有那一分清淨的無私大愛，就有一股清流。無論清流泉源在何處湧現，水性清淨如一。」（釋德凡 2008：210）意指人人有愛人的本能，猶如水性本清淨，人有發揮「無私大愛」的良能。為何要強調不為私己的「大愛」，證嚴的觀照點在於近年來天災人禍頻仍，從 1999 年台灣發生 921 大地震，2001 年美國發生 911 遭恐怖份子攻擊事件，2003 年美伊戰爭開打，又逢「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擴大，2004 年年底南亞發生地震海嘯，傷亡皆十分慘重，次數也越來越頻繁，證嚴每每強調「驚世的災難，要有警世的覺悟」，認為救世要先救心，尤其是淨化人心。她常憂心「來不及了」，呼籲志工信眾要多發揮愛心善念，更要推己及人，「人間菩薩招生」，即帶動更多人如「人間菩薩」般，幫助苦難者，不斷強調「啟發眾人愛心」的現實迫切性，如此才不會造更多的惡業，釀成更多的天災人禍。

因此，慈濟經驗詮釋「百川歸海」的第一種涵義是——人有發揮無私大愛的潛能，是各大宗教都認為可以提昇人性的目標。如希克所指，每一個宗教，如果不說在實踐上，至少在觀念上，都努力提供信徒一種訓練，打破由於依附自我而造成的束縛，擁抱他者，成為他者的一部份，並因而得以轉變(Hick 1983:467，引自 Knitter 2003:177)。證嚴法師雖然以佛教信念和情操創辦慈濟，但屢屢強調和其他宗教的共通處：「宗教只是一個名相，都共同教導人人要有愛心，宗教本來就是很開闊的心胸，心中有愛。」³⁶她和不同宗教人士的交談，也不涉及思想教義內容的交流，只強調有行動為證的「愛」的關懷。如 2004 年年底南亞發生大海嘯，慈濟赴斯里蘭卡賑濟災民，提供義診、物資，為災民興建帳棚，亦有不少當地人協助輸運救災物資。次年春節，有十三位當地志工到花蓮精舍訪問，並討論慈濟在當地建屋的計畫，他們分屬醫師、律師、建築師等不同行業，信仰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及佛教。臨別前他們向證嚴法師發表心得，雙方展開一場宗教交談。

一位貿易公司的老闆是基督徒，提及在靜思精舍的體驗：從來沒有過與上千人如同「一家人」的感覺，所有人平等地相互對待。他認為證嚴有「特殊超凡的愛的能量」，才能影響這麼多人願意跟隨，奉獻服務³⁷。一位協助印製米袋的塑膠業者則表示感激慈濟的實質協助：

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相信上帝，相信不論我向上帝要求什麼，我都可以得到；但是日前國家面臨災難時，我從慈濟得到幫助，我不知道要如何跟上人說感恩，對我來說，上人就是我另一個有求必應的上帝。我求上帝把我的壽命延長給上人，讓上人能住世更久。³⁸

證嚴法師在回應他們時，則強調彼此信仰的共同點：

³⁶ 98 年 5 月 19 日精舍志工早會談話。

³⁷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5 年春之卷，382 頁。

³⁸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5 年春之卷，387-388 頁。

不論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等，相信只要有正向的宗教信仰，心性都是善良的。我常常告訴慈濟人，宗教就是人生的宗旨、生活的教育。……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愛。……當我們有愛心要為苦難人付出，就不會去分別國家、種族，因為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家人。神愛世人，不論是什麼宗教的教主，都是如此教育大眾。……我們的愛要普遍於各個空間，我不只是愛台灣，各位也不只要愛斯里蘭卡，應該要愛普天下之人，只要何處需要，我們有力量，就應該去付出。³⁹

法師邀約這些斯里蘭卡的志工發揮長情大愛，由於有許多救濟工作要做，她鼓勵他們要以「過秒關」的心情，善用時間，才能為普天下這麼大的空間之下的人做事情，在互動下啟發更多的愛心。

以上對話顯示，證嚴法師心繫更多人投入解救苦難的行動，視天下人如親人一樣地關懷。她被視為有「特殊超凡的愛的能量」，類似的形容也出自筆者所訪談的雅加達穆斯林女性志工，她們認為法師是有濟世大愛的慈善家。這也是法師與其他教界人士交流，甚至獲得非佛教徒（如南非祖魯族女性志工）愛戴的原因。又如國際人醫會成員每年在中秋節前夕到花蓮舉行年會，據筆者參與幾次年會活動的觀察，許多外籍醫療志工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宗教氣質與慈濟佛教徒志工有所不同，但他們對證嚴法師也流露尊敬，甚至仰慕之情，與法師保持聯繫，長年熱誠參與，甚至在有些國家負責慈濟的醫療服務。

證嚴法師所謂「愛普天下的人」，也展現在對其他宗教和在地文化的包容，她說：「排斥其他宗教，也是一種無明，將衍生無盡煩惱。」又說：「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和信仰，才能使他們真正安居樂業，讓孩子能安心讀書，未來成為社會的良才。」⁴⁰她指示慈濟在海外為災民興建的屋舍，建築風格順應在地觀點和需求，和在台灣所建的一樣皆取名為「大愛屋」或「大愛村」，標舉「大愛無國界」的精神。印尼雅加達和亞齊「大愛村」都設有伊斯蘭教禮拜堂，即是在此原則下衍生的結果。

慈濟經驗中「百川歸海」的第二種涵義，便是對其他宗教態度上的尊重與包容，證嚴強調宗教間不應起分別心，既然各自都教導愛，只是殊途同歸，便要彼此讚嘆。她常說：「正信的宗教要如大海般開闊，如大海納江河的水一樣。」其意指涉各大宗教教導的對所有生命展現愛與慈悲。但此「大愛」精神的實踐多藉助海外華人志工，他們未必都是佛教徒或有宗教信仰，他們或是台灣移民，或在當地長大，大部分是在海外才加入慈濟，他們在當地社會中屬於和下層民眾有距離的中上層階級。證嚴法師對他們提出的訴求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感恩圖報」的做人修養：「腳踩別人的地，頭頂別人的天，應該知道感恩回饋。」期望他們要「取之於當地，用之於當地」，有所回報。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印尼，華人在此和印尼人長期以來有矛盾的種族和階級關係，如三百多年前有一萬多名的華人被屠殺，血染溪河，這也是「紅溪河」得名的由來。在1998年的排華暴動中，數

³⁹ 《證嚴法師納履足跡》2005年春之卷，388-392頁。

⁴⁰ 《慈濟月刊》428期，52頁，2002年7月號。

千家華人商店和房屋也被燒毀。慈濟後來在印尼投注大量援助，主要借重於華人企業家的力量。證嚴法師說動這些企業家出錢出力，源於 1998 年動亂跡象發生之初，一位基督徒的企業家陪其子來台皈依證嚴法師，法師跟他們強調，印尼貧富懸殊太大，有錢的人都是華人，所以會造成種族歧視，造成彼此間的對立，生活的困境使當地人窮則反，如要讓雅加達和平一些，有錢人要多付出愛心，去關懷他們。筆者在雅加達進行研究時，目睹耳聞多位企業家志工受到法師感召，已長期投注於改善社會下階層民眾的醫療住居問題。

昭慧法師觀察慈濟志工對印尼此全世界最大的伊斯蘭國家的協助⁴¹，提出佛教的社會實踐觀點，認為慈濟不以慈善為手段趁機傳教，這應是來自於佛法無我智慧的寬廣心量。且華人以慈濟大愛將財富良性分配，無形中也化解了昔日來自於種族、宗教、貧富階級等差異所導致的藩籬隔膜與血腥衝突。筆者同意此說，佛法不分對象，對「眾生」的普遍關懷，是慈濟強調不傳教、無所求的信念依據，也產生華人志工人身安全較有保障的社會心理效應，類似的效應也見於貧富差距懸殊的南非，如有穿著「藍天白雲」制服的華人志工平安度過可能被奪去財物性命的劫難。

慈濟國際援助的持續，對一些華人志工而言，此「行善積德」的華人文化期待或已成為部分動機，但主要動力應來自於證嚴法師從生存環境，發展「眾生同體」的「一家親」全面觀照，反映不同於「腳踩別人的地，頭頂別人的天」的國際視野，對志工的行動產生和佛教信念有關的影響力。

證嚴法師常強調所有人都因共處「天蓋之下，地覆之上」而親密相連。例如，2004 年南亞海嘯後，慈濟赴斯里蘭卡賑濟災民，發現這個有近百分之七十國民是佛教徒的國家，歷史上多次受外族侵略殖民，種族、宗教間迭有衝突，在北方有長期內戰，導致國家政經建設停滯⁴²。法師曾慨嘆道：

天蓋之下，地載之上，同為一家，為何而爭？如震央亞齊，長年累月都在爭戰之中，不同宗教的人們相爭、政權與政權相爭，你打我、我打你，沒有人說好話，也無暇做好事。另一個重災的國家斯里蘭卡，雖是佛教國家，但國內多年來亦有對立與爭奪，所以賑災醫療團去到當地，我很擔憂，本來知道地雷區在哪裡，海嘯過後，地雷已經不知散置到何處了，當地共業不斷，令人擔心。深沈的道理沒有人要去理解，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去疼惜、安撫，光是在膚面的爭執。⁴³

證嚴的觀點超越政治歷史恩怨的事實，憂慮爭鬥導致的國家社會亂象不已，她認為人類同處地球上的天地之間，可說「同為一家人」，提出「不知為何而爭」之問。她提及慈濟的集會所「講經堂」講台高掛的「佛陀灑淨圖」，指現在需要的是「撫慰地球」的精神，志工要學習佛陀的自覺、覺他精神，疼惜地球上的苦難

⁴¹ 釋昭慧（2003），〈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例—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法光學壇》第 7 期。

⁴² 斯里蘭卡駐台灣佛教代表強帝瑪法師曾在災難後和証嚴法師見面，討論慈濟在當地的賑濟工作，也介紹斯里蘭卡的政經狀況。參《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5 年春之卷，37 頁。

⁴³ 《證嚴法師衲履足跡》2005 年春之卷，26 頁。

生靈。又如 2009 年 5 月間，阿根廷的慈濟志工到巴拉圭舉辦義診，車程長達十九個小時，證嚴法師在志工早會中一面讚揚，一面也重申她常講的「一家人」的觀念：

生在同一片天蓋之下，不管你跑到哪裡去，都是同樣一片天所蓋之下，同時也是在這一片大地成長的，都是在一片土地上，所以應該到了那裡去，也可以親如同一家人⁴⁴。

法師常用的「一家人」比喻，既源於佛教所言「心佛眾生都是一體」，也出自法師對地球不斷被破壞，導致天災頻仍的憂心和關懷，認為所有人的生存休戚與共。她鼓勵弟子信眾以「堪忍大願的菩薩行」救苦，即使路途遙遠，也要學菩薩一樣「難行能行」。

此「一家人」的比喻，指向人類在地球上之為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慈濟志工的關懷和陪伴，尤其是海內外的團康活動，也醞釀出一種像「家」的溫暖氛圍，從「一家人」手語歌被大量運用可見一斑。因為簡單易學，溫柔的旋律和歌詞頗能打動人心，既呼應也召喚出人在受難時，需要被關愛的情感需求，不只獲得本文所提到的穆斯林女性志工的共鳴，也在許多義診和發放的活動中發揮撫慰作用。許多受助者所以也成為志工助人，和在慈濟團體內被平等接納，得到像「家」一樣的歸屬感有關。筆者以為，這份出自情感的動機比信仰的訴求更為有力，成為慈濟團體內不同教徒共事的基礎。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許多地區，非佛教徒也參與慈濟的繞佛、浴佛儀式，並非他們接受了佛教信仰，而是和慈濟標舉的「天下一家親」的「大愛」精神有所應和。

筆者曾為文分析（2002），慈濟的發軔源於舊社會的鄉土人情，照顧鄰里的孤寡貧病之人，造就出慈濟人情取向的社群性格。筆者觀察，慈濟在國際化之後，此性格仍是志工活動的情感動力，災難的發生也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在慈濟舉辦的祈禱晚會中彰顯無遺。此類祈禱晚會源於 2001 年桃芝、納莉颱風重創台灣，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驚爆世界，證嚴法師有感於人類因愚癡引起貪念，使大自然遭受嚴重破壞，造成土石流氾濫，人心的偏差仇恨也使無辜生靈受難，因而呼籲大家要有「警世的覺醒」，疼惜「膚」慰人間。慈濟隨即推動「一人一善，遠離災難」的理念，志工從 10 月 13 日（一〇一三的諧音為一人一善）起，進入社區或團體，舉辦「愛灑人間」的祈福活動。這天晚上在台北、台中、高雄、花蓮同步舉辦燭光晚會，以音樂、朗誦、演說的方式宣揚愛與和平。除佛教外，其他宗教人士也應邀參與，這項祈福活動也在一些教堂和天主教所辦的老人院中舉行。

當地球有大災難時，宗教共同為和平而祈禱因目標單純，較易獲得響應。慈濟辦的這類晚會並非出自傳統佛教，人人手持燭光默禱的氣氛營造很可能得自西方教堂聚會的靈感，晚會取名為「祈福」或有漢人信仰中求福佑的文化特色。然而，當地球的災難頻仍，慈濟的跨宗教祈禱活動也越見頻繁。如志工在海外災難地區進行的「祈福晚會」，甚至「浴佛節」活動中，常見到非佛教徒以不同手勢（如穆斯林將雙手手掌攤開朝上），共同祈禱的報導畫面。2009 年 8 月 8 日台灣

⁴⁴ 98 年 5 月 19 日精舍志工早會談話。

南部發生嚴重水災後，許多慈濟援救過的海外民眾和志工，也參與慈濟在當地的晚會，在燭光中共同為災民祈禱，有人淚流滿面。祈禱的背景音樂通常是詞義帶有佛教色彩的慈濟歌曲，但非佛教徒顯然不在意這點，是受苦經驗和祈求超越苦難的共同想望，營造出某種情感氛圍，將所有人連繫在一起，不分施者與受者，同樣浸潤在撫慰悲傷，追求平安的真實人性中。人心在動盪之餘，或更能體會人類相互依存與互助的關係，這已不只是宗教團體的交談，而是人與人間的交感。

這是慈濟經驗詮釋「百川歸海」的第三種涵義，人們跨越種族、宗教與文化之別，從受災難威脅的生存處境，感到彼此是命運共同體，產生親密的牽繫。即使語言不通，但人們對共同的需求都情知意解，可以不落言詮，如宗教對話學者潘尼卡（Raymond Panikar）所言，宗教對話可能靠「祈禱」、靠「沈默」來無言地理解對方，這是基於「諸宗教先驗統一」或一種「本質的和諧」（2001：28）。本研究顯示，除先天條件外，後天的現實環境也會激發團結感，發現彼此間的差異並不大。尼特指出，一起行動過的宗教徒也必然想一起祈禱/默想和慶祝，行動之後再坐在一起，與僅僅坐在一起明顯不同，會使祈禱和儀式更明確、生動和有方向（2003：251,253）。尤其是慈濟的晚會冠上「愛灑人間」或「感恩與祝福」之名，不只是被動地求佑，也有積極的行動導向。祈禱過後，更能激發出救援苦難的行動熱忱，增添宗教間合作的力量。

本節討論慈濟跨宗教合作的經驗如何詮釋「百川歸海」的涵義，以證嚴法師指導性言論訪談為基礎，配合研究觀察所得作分析，發現其信念是佛教的人性清淨論，相信人有發揮無私大愛的潛能，此潛能是各大宗教致力於開發的人性基礎和理想，慈濟的濟世作為提供此理想實踐的機會，此處「海」的意象是人們共同營造的「大愛」。其次，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採尊重與包容的原則，如請當地宗教長老主持儀式，對災民的建屋援助包括提供其信仰的禮拜場所⁴⁵，此舉既是菩薩利他精神的展現，也反映宗教提升自我，與他人合一的普同理想，「海」的意象可說是「包容他者的胸襟」。災難是慈濟與其他宗教合作的契機，共同援助苦難的行動過程中，不只實踐解救（或解脫）神學的終極關懷，也凸顯全球人類命運相連的終極現實，「海」的意象至此變成「全球人類福祉」。這三種涵義都是從宗教合作的實際行動中展現，不涉及宗教教義思想的交流，以付出無求的宗教情操，發展「眾生同體」「一家親」的全球關懷，因為得到關懷與信任，所以許多受助的窮人也成為助人者，從人性的共同經驗，進行道德視域與行動的融合，形成慈濟所謂的「善的循環」或「大愛的循環」，跨越了宗教信仰差異的藩籬，結果卻也呼應當今各宗教應共同解決苦難的倫理責任。

⁴⁵ 慈濟的包容原則也遇過衝突，如雅加達「大愛二村」穆斯林村民曾要在村內宰羊獻祭，慈濟在村內的行政管理中心則以佛教不殺生為理由，希望他們在村外宰殺，雙方僵持不下時，慈濟曾請一村的長老出面協調。據聞後來不了了之，二村居民仍依其與鄰人分享的習俗，在村內禮拜堂旁宰羊。這類因各自信仰見解而發生的敏感事件，似乎並無雙方都滿意的解決之道，因為涉及地區性的不同處理方式，也與本研究的主旨無直接關連，因此不在討論之列。

結論

大部分的宗教交談會討論形而上的「上帝」或「神」的存在問題，各宗教對人神關係的不同認知，以及儀式象徵等，但也要指向個人的責任，即「人類對於維持道德品行、自然世界及人類的繼續生存，負有什麼責任」，「吾人怎樣做才能對這世界最有助益」之實際問題⁴⁶。這也是 1993 年 8 月於芝加哥召開的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Parliament of World Religions) 的關懷所在。Michael Tobias 觀察指出，會中清楚的關切要點，是警覺到「人的暴行與喪失信仰，正在損毀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的地位，破壞人類謀求公義、幸福、精神生活的能力」，但是人的心靈知道，在暴行、衝突、混亂之外，還有其他選擇，例如真善美的追求。宗教差異雖然一直使整體社群之間產生隔閡，個人卻往往比集體來得有韌性，許多人甘願默默以愛心進行實驗，探索導向共鳴與非暴力的新路徑，這反映宗教的多元性實含藏著某種統一性。⁴⁷

這項會議的重要成果是，來自兩百多個宗教組織的八千位代表中，絕大多數都簽署了《走向全球倫理宣言》，這是在宗教史上得到最多宗教之信徒接受的倫理宣言。起草人天主教神學家孔漢思指出，他避免引用任何宗教經典，宣言所舉的是「有約束力的價值觀、不可取消的標準和內心的基本態度的層面」，「關心的仍然是人的內心世界，是良心的領域，是“心靈”的領域」；「人們可以在每一種大的宗教傳統或倫理傳統中發現它的起源：“每一個人都應當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存在著所謂的“金規則”，在所有的大傳統之中，這條規則都可以得到類似的表達：“己所不欲，勿施於人！”」⁴⁸

庫舍爾(Karl-Josef Kuschel)認為，這份宣言所以得到肯定連署，表示每一個宗教都受到感召，要運用自身的倫理傳統和靈性資源，為全人類的幸福做出貢獻；這些倫理傳統和資源可以支持宣言的導言所說：“我們是相互依存的。我們每一個人都依賴於整體的福利，所以，我們珍視生物共同體，珍視人、動物和植物，珍視對地球、空氣、水和土壤的保護。我們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負有個人的責任。”⁴⁹孔漢思特別強調，這份宣言的名稱是“走向全球倫理宣言”，而非“走向全球倫理學”的宣言，“倫理”指的是一種基本的人類道德態度，而“倫理學”指的則是關於道德態度、價值觀和規範的哲學或神學理論。⁵⁰其意是指態度指向實際的行動，不是光說不練的理論，每人都有責任在生活中實踐這些道德理想。如《心靈的殿堂》編者之一 Bettina Gray 說，她曾在二十年中參與十數次不同宗教間的對話，看見以前不同宗教間的猜疑、爭端，甚至暴行，轉變成漸增的同情與合作，此行動上的轉變使她有如下體會：

⁴⁶ 《心靈的殿堂》，15 頁。

⁴⁷ 《心靈的殿堂》，14-16 頁。

⁴⁸ 孔漢思(1997)，〈走向全球倫理的歷史、意義與方法〉，出自《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孔漢思、庫舍爾編，何光瀟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55 頁、59 頁。

⁴⁹ 《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113-114 頁。

⁵⁰ 《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61 頁。

多少年來，我留在宗教研究的領域裏的個人動機，不可能只憑知識份子的好奇心或唯心論者的社會信念，或是神學信仰。而是因為有那些來自不同信仰的人將各自宗教的至高目標—愛心、慈悲、無暴力、無私的大度—不斷重申強調，令我衷心感動。一般書籍和講堂上那樣的比較宗教研究，根本沒有講到這方面。而信徒們審視自己的宗教，從中找出真正的精神，找出有意義、有方向、帶來希望的精髓，並且予以實踐，這才是最啟迪人心的。⁵¹

Bettina Gray 意指信仰的「實踐」是宗教研究吸引人之處，尤其是「宗教交談」與「宗教合作」的研究不可能忽略此向度。

因此，行動層次上的交談與合作益形重要。本研究顯示，這樣的宗教交談合作比教義思想的交流更為有力。深刻的宗教交談來自於同時面對天災人禍時的行動共鳴，苦難的景象會激發人惻隱之心，喚起各宗教崇尚的互助互愛精神，在國際救援行動上有動人的體現，不問各自的信仰為何，為幫助有難者活下去而願意共同付出。祈願和平是人們共同的心聲，而具普同性的精神價值雖為各宗教所宣揚，但更重要的是要靠個人的努力去體現。在個人經驗層次上，宗教信仰未必是助人行動的原初動力，助人的氛圍場域，或宗教領袖的教化典範，都可能激發更多人加入解救苦難的行列。

本文探討慈濟國際救援的跨宗教合作經驗，如何關連到今日宗教交談與合作的議題，尤其是共同解決人類苦難問題的倫理需求。針對許多宗教學者提到的「百川歸海」譬喻，以及證嚴法師所言「宗教如大海」的類似說法，分析慈濟的經驗詮釋，包括人心歸向和實踐「大愛」的潛能和作為、宗教包容他者的胸襟，以及宗教對全球福祉的現世關懷。慈濟跨宗教合作的基礎不在宗教思想教義的交流，而是提供不同宗教信徒信仰實踐的機會，從救苦中體會其信仰的真義。證嚴法師「靜思語」的傳播及其精神風範，引發人性道德倫理的共鳴，因其實踐取向，成為非佛教信徒參與慈濟志工服務的觸媒。訴諸佛教「眾生平等」的理念，和對生存處境的人情關懷，尊重包容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分別施者與受者，影響許多受助者也成為助人者，是慈濟海外經驗可以對舉世宗教對話課題提供的視角和貢獻。

宗教對話學者尼特指出，全球責任使信教的人能夠跨出更加大膽的一步，以此「倫理任務」和「宗教經驗的共同背景」，養育和改造我們的不同宗教傳統，不同信徒可以「更好地理解 and 傳達彼此的宗教故事和語言」（2003：183-4）。以此觀之，慈濟的跨宗教合作經驗對佛教的濟世傳統已有所創新，未來是否開展宗教經驗和教義方面的宗教對話，特別是證嚴法師對非佛教徒產生影響力所代表的意義，及其如何關連到佛教的現世關懷和貢獻，均值得注意與再加探究。

⁵¹ 《心靈的殿堂》25-26 頁。

參考書目

- 丁仁傑 (2003)。捍衛社會身體：台灣 SARS 疫情中的災難治理及其宗教論述。
思與言，41 (4)，1-70。
- 王純娟 (2006)。哀傷或不哀傷？當西方的哀傷治療遇上台灣的宗教信仰與民俗。
生死學研究，3，93-131。
- 孔漢思 (Hans Kung) (1997)。走向全球倫理的歷史、意義與方法。見孔漢思、
庫舍爾 Karl-Josef Kuschel (主編) *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何光瀟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尼尼安斯馬特 (Ninian Smart) (2004)。 *劍橋世界宗教*。許列民等譯。台北：商
周出版社。
- 何光瀟 (2008)。 *百川歸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武金正 (2000)。宗教交談基本面向。 *宗教交談理論與實踐*，黃懷秋等著，頁 1-42。
台北：五南出版社。
- 林美容、丁仁傑、詹素娟 (合編) (2004)。 *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
化重建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房志榮 (1999)。「宗教人」與「宗教之間的人」。 *宗教人通訊*，1，2-4。輔仁大
學宗教系。
- 保羅尼特 (Paul Knitter) (2003)。 *一個地球，多種宗教：多信仰對話與全球責任*。
王志成等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約翰希克 (John Hick) (2003)。 *宗教之解釋*。王志成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雷蒙潘尼卡 (Raimon Panikkar) (2001)。 *宗教內對話*。王志成、思竹譯。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
- 劉述先 (2001)。 *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台北：立緒出版社。
- 盧蕙馨 (2002)。慈濟志工行善的人情脈絡。 *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刊*，1，31-68。
- 釋昭慧 (2003)。佛教慈善事業的一個範例—慈濟整治印尼紅溪河之成效與意義。
法光學壇，7，1-26。
- 釋德凡編撰 (2002)。 *證嚴法師納履足跡，冬之卷*。台北：靜思文化。
- 釋德凡編撰 (2003)。 *證嚴法師納履足跡，冬之卷*。台北：靜思文化。
- 釋德凡編撰 (2005)。 *證嚴法師納履足跡，春之卷*。台北：靜思文化。
- 釋德凡編撰 (2008)。 *證嚴法師納履足跡，夏之卷*。台北：靜思文化。
- Amaladoss, Michael. (1992). Liberation as an Interreligious Project. In Felix Wilfred,
ed., *Leave the Temple: Indian Paths to Human Liberation* (pp. 158-174).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 Maguire, Daniel C. (1993). *The Moral Core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Reclaiming
the Revolu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 Michael Tobias, Jane Morrison, Bettina Gray 編著 (1997)。 *心靈的殿堂*。薛綸譯。
台北：立緒。
- Schillebeeckx, Edward. (1990). *The Church: The Human Story of God*. New York:
Crossroad.